

国企改革应着力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力

章玉贵

国企改革三阶段目标递进

近日,有关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等诸多猜测,在局部引爆市场热情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改革走向提供了新的参照系。

负责国企改革整体性方案设计的国家发改委日前发文称,国企改革系列配套文件已基本形成,而18日召开的第十五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强调要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要在国企、财税、金融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力度大、措施实、接地气的改革方案。预示本轮国企改革的力度和可操作性都将较以往有突破性提高。而媒体猜测的国企改革“1+N”方案,即先出台一个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再推出若干个与之配套的分项改革实施方案。从上海、广东等先行先试的省份来看,相关改革的试点企业已经选定,将着力探索国资国企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目标定位与市场空间。而所谓的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之说,笔者认为,中央不会设定一个单一参照系,而是鼓励各级各地不同类型国企激活各自改革动力,只要在国资运营和国企发展目标上与顶层设计方案保持一致即可。

从时间序列来看,本轮国企改革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阶段具有标志意义的改革。第一阶段的国企改革严格意义上说起始于1984年,主要特征是“放权让利”,目的是使国企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此轮具有标志意义的承包制改革并不成功;国企改革的第二阶段则是以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确立了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即从1994年起,国企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

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此后国务院和各地先后选择了2700多家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路径。该阶段,国企改革诞生了诸多模式,也取得了不少突破,特别是培育出一批初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央企,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进而获取全球资源配置权打下了基础。

国企改革第三个重要阶段起始于2013年,是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指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框架下,给出了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路线图。本轮国资国企改革,其目标指向是通过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让主管部门由管资产转向管资本,减少对企业活动的干预,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形成国资委、国资运营投资公司、国企之间的三级结构模式,理顺监管者、资产所有者和微观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此后,以北京、上海、广东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各自出台国企改革试点方案,国资委则在115家央企中选出中粮等6家企业纳入试点改革计划,探索央企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央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以及央企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等等。而在金融企业体制改革方面,以中信、光大和交通银行等为代表的改革试点获得了市场的积极反应。中国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改革则从今年启幕,其撬动整个金融市场的改革效应尚难以估量。

作为全世界经济改革领域最为复杂的命题之一,国企改革绝非几份文件和几个试点就能找出求解之道的。国家目标,国企改革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国企的本质属性,其究竟是特殊市场主体还

是普通市场主体,其在承担某些公益或曰社会职能的同时,是否应当获得某些特殊配置权。而遭到普遍诟病的国企在资源型领域和某些关键领域的垄断,是否应当在此轮国企改革中被打破,相应的适应竞争性市场体系建设的政府规制是否应当及时出台,以及作为特权标记的国企行政级别制,是否应当通过改革一步到位取消;另一方面,如果改革是要还原国企的作为平等市场参与主体的本源地位,那么国企负责人对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合理追求与有效使用是否应当得到满足。所有这些都是本轮国企改革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各地的试点方案还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所有关于国企改革的探索,其目标指向都需回答一个关键性问题:国企在中国和世界经济棋局中究竟该有怎样的定位?对地方国企而言,尽管需要承担某些社会功能,但其作为市场平等参与主体的角色不可随意扭曲。换句话说,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要营造竞争性市场体系。在这个市场环境里,国企和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边界就容易明晰,国企、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由容易厘清。

志在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力

对以央企为代表的超级国企而言,能否培育出一批指标性的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的企业群,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指向。

国企改革的目标肯定不是消灭国企,全世界排名前10位的主要经济体中,都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企

存在,因此,国企本非魔鬼毋需妖魔化。但在中国,之所以国企改革长期战略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位置,屡屡上头条,盖因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国资国企体系,而关于国资与国企改革鲜有现成的参照系。因而改革的难度与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即中国的100余家央企,肯定不能单纯参与国内市场中存在和发展,而是必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必须在全球高端价值链环节要拥有一席之地。而从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央企来看,部分企业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基础。

因此,此轮国企改革,无论具体方案如何,都不可回避一个重要目标指向:即必须造就一批(例如30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的中国国企集群。而这些国企要实现该目标,亟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股权结构、治理框架、企业文化、战略运营以及人才建设等方面进行相应改革,全面采用国际商业规则,使其不仅能够与皇家壳牌石油、埃克森-美孚、GE以及汇丰、丰田、三星等超级企业并驾齐驱,而且能够在全球化运营中萃取出具有国际普适性的中国企业治理模式。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国企所表现出的市场行为,无论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都无法质疑其背后有任何政府动机。中国企业获取全球资源配置力的目标也将水到渠成。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调整恢复仍是房地产市场主基调

项峥

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数据,2015年1-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6.1%,较上年同期大幅回升13.7个百分点,较今年1-6月提高2.2个百分点,继续呈现回暖态势。今年3月份以来,在中央及地方稳定住房消费政策的刺激下,房地产市场有所释放,住宅成交明显活跃。但即使如此,我国房地产市场还未恢复到周期调整前水平,调整恢复仍是市场运行主要基调。

全国商品房交易量还未恢复至市场调整前。2014年1-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6%。这表明,全国商品房市场要恢复到2013年同期交易量水平,2015年1-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至少要达到8.2%,而实际增速只有6.1%,还差2.1个百分点。而随着稳定住房消费政策效应衰减,下半年全国商品房交易活跃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从中介机构监测数据看,目前房地产市场交易有降温迹象。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监测,2015年7月监测的主要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2.21%。8月份,北上广深新房和二手房成交开始回落。近期北京通州限购政策出台,将会有效抑制市场投机行为,但也可能会降低市场交易活跃度。

房地产市场恢复仍面临重重制约。自2013年四季度进入周期调整开始,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整业已历时长约近两年时间。虽然稳定住房消费政策的强力刺激,刚性住房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明显释放,但住宅市场供求关系已基本平衡,使得房地产市场价格再次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极小。一线城市住宅价格涨幅明显,不排除是高端住宅入市量增加和投资投机性需求抬头的综合影响。就全国市场而言,房地产市场恢复仍面临重重制约:

一是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制约房地产市场有效恢复。宏观经济增长与房地产业之间的关系可能远非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过去,房地产业繁荣推动了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现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却抑制了我国房地产业需求释放。但同时,也恰恰因为房地产业的周期调整,导致我国社会总需求不足,进而拉动宏观经济增长。就目前情况分析,我国经济“转方式、调结构”进程还没有结束,加上外部需求尚未恢复至国际金融危机前,宏观经济增长压力有增无减,进而限制了房地产市场恢复和增长空间。

二是局部地区房价过快增

长将导致市场需求快速萎缩。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今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分别有27个和42个,分别比上月增加了7个和5个;下降的城市分别有34个和20个,分别比上月减少了9个和8个。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27个城市中,有20个城市涨幅比上月扩大,涨幅在0.5%以上的城市有6个;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42个城市中,有27个城市涨幅比上月扩大,涨幅在0.5%以上的城市有15个。住宅交易价格上涨过快将对市场需求形成有效抑制,特别是城市住宅供求总体趋向平衡的情况下,应该高度关注住宅交易价格对市场成交量的消极影响。

三是微观主体心理预期稳定性下降也将影响到住宅市场交易。从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析,制造业结构加快调整导致市场需求出现萎缩。当前我国制造业内外需求仍然偏弱,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49.9%,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回落至临界点以下;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7.9%,低于临界点,且连续两个月回落。虽然制造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将来形成优势产业,但结构调整阵痛可能会影响到工业企业市场预期,也会影响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据尼尔森公司发布的2015年第二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今年上半年我国一、二线城市消费信心指数下降较快。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巨幅波动、希腊债务危机、美元加息等,都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运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微观主体的稳定市场预期。

四是房地产业基本面变化也影响到市场成交量有效恢复。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率下滑已成共识。根据某大型房地产上市公司2015年中期报告,虽然上半年营业收入虽然增长超过20%,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却不到1%。即使是全国房地产交易量回升,也出现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宣布破产的情况。特别是2015年1-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211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2.0%;土地成交价款3593亿元,下降25.6%。这些情况表明,我国房地产业基本面也出现了较大变化。

综合来看,我国房地产业数量型增长模式发展空间非常有限。房地产业应尽快从数量型增长转到质量有效提升的新道路,旧房改造,居住品质提升将给予未来房地产业新的增长动力。

国企改革顶层方案呼之欲出

许岩

本周一以来,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出台的预期前所未有地增强,各界对此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两个月内五次在不同场合谈及国企改革思路耐人寻味,这些讲话也透露出国企改革的一些重要动向和信号。

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多年来,国企改革成绩斐然,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国有企业发展已经经历了两轮改革:第一轮主要是通过关停并转,使大多数亏损国企摆脱困境,堵住了国有资产“出血点”,国有企业退出了一般竞争性领域,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轮是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企业战略重组,使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作用愈加明显。

如今,国企改革再次成为争论焦点。此前的国企改革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利益输送的个别现象,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和流失,一些人因此对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认识存在一些偏颇和误区,甚至反对改革;有的人只要一提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就觉得是“推进私有化”,或者简单地“一混就灵”;央企限薪,本意是调整不合理的薪酬结构,也在个别单位搞成了“一刀切”,从上砍到下,基层一线员工也未能幸免。

由于这样那样的误读错判,国企改革进展并不顺利。也正因此,本轮国企改革如何有效突破?改革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改革的底线在哪里?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多费思量。回顾中国改革历程,思想解放都是改革的前提,关键时刻需要关键声音。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谈及国企改革的思路耐人寻味。这些思路不仅纠正了当前社会上对于国企改革的一些错误认识,更为进一步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国企改革划定了标准、明确了底线,坚定了决心。

首先,国企改革的决心已下。事实上,加快国企改革已十分紧迫。十

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开始走上转型之路。“换挡”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动选择。上至顶层设计,下到政策落地,管理层的决心和力度已可见一斑。当前,国企经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企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5.8%,利润同比下降0.1%。

适逢面临美联储加息的国际大背景,中国的结构性调整并不顺利。在中国经济不断调适个位数增长的过程中,试图以“增股市直融,去地产化”的实体经济加减法运算在国与国之间的此消彼长博弈中,已然成为险象环生。可见,加快国企改革已势在必行。

其次,国企改革的标准已定。衡量国企改革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必然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长春考察调研时,对国企改革作出了“三个有利于”的重要论断。正是这样的参照系和判断标准,使改革者既有方向可依,又有路径可循,同时还能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对照解决问题。深刻把握“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国企改革具体实践就有了向上向好的评判细则,从而使国企改革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此外,国企改革的底线已划,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被看作是国企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底线。2015年6月5日召开的深改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两份关于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文件,一个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另一个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可以说,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已开展的数轮针对中央企业的巡视中,中央巡视组发现为数不少的“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链条性腐败”,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两个文件审议通过,将有利于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

改革的决心、目标和方向都已明确,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应该不用再等很久。

昨日沪指由跌转升实现大逆转



沪指午后大逆转,亿万股民心打颤。表现平平金融股,领涨又是中小盘。国企改革有动作,题材分化成冰炭。证监会否再出手?市场或将拉锯战。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对证金或汇金勿存不切实际的预期

蒋光祥

救市以来备受关注的证金公司已基本完成自己的这段历史使命。虽然对其所有尚有争论,但回头审视刚刚过去的这波刻骨铭心的大调整,在市场流动性都跌没了的时候,由央行为其开具“无限额信用卡”,证金公司出面着手力挽狂澜,稳定市场,不啻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抉择。客观地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以市场为前提的发达自由经济体成熟市场,在股灾来临之时种种应对,与此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这些国家、地区的政府或监管部门在股灾发生时也未袖手旁观,或间接、或直接地参与到调控股市当中来。

证金公司的本职是提供转融通服务。即借入证券、筹得资金后,再转借给各证券公司,为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提供资金和证券来源。而维护市场秩序稳定,则是其业务规则中所赋予的监督管理融资融券市场的职能,更是更

高层所赋予的重任。

无可否认,证金公司的角色亦是垄断性的。因而证金公司能在源头上控制资金的规模,便于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市场过热、泡沫严重时,证金公司可以收缩转融通的放款额,减少资金供给,以缓解过热经济。证金公司可以按照资本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强度调节资金供给,也可以按照国家政策指示对市场进行监控,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在国内其他大型机构还不能担当市场定价平衡器的当下,证金公司募集的资金已经成为A股市场事实上的平准基金。在市场失灵、流动性严重不足时,通过证金公司等特定机构维护市场稳定,维护国家资产价值中枢的稳定是必然之举;在市场稳定程度得到确认时,证金公司对市场的介入程度自然会减弱,直至退出。

当然,作为曾经备受国内外关注的“救市主”,退出也不可避免地处于万众

聚焦当中。这点从前不久稍有退出风声,市场便反映剧烈,直至监管层出面以正视听,局面方得以稳定。不难看出,证金公司目前逐步将其所持有的股票由汇金来“接班”,并且是通过协议转让这种非二级市场买卖的平稳方式,可谓用心良苦。证金向汇金转让部分股票的同时,明确表示今后若干年内并不会完全退出,当然,今后不一定再采用入市操作的手段。可见相关层面也已经意识到随着市场波动由剧烈异常逐步趋向常态化波动,让一度失灵的机制重新运转,发挥市场自我调节作用的时刻已经到来,市场的内在稳定机制也有望得以完善。

而汇金公司类“金融国资委”的定位,决定了没有比它更合适的机构来接替证金公司的角色。向其转让部分股票之后的证金公司,腾出了空手,又补充了新弹药,仍可以对将来或有极端市场行情保持“核威慑”。

无论是“人弃我取”,不与其他市

场主体争夺利益的证金公司,还是计在长远、不急一时的汇金公司,仔细观察,其实在本轮巨震开始之初,还是有仓位下降的跟踪。反思今时或者过往,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工作还是需要更重视一些,采取的措施需更实一些,尤其对通过各种手段入市的杠杆资金要自始至终严格监管,部分散户的“记忆只有七秒”,待股指略有回升,民间配资就已有回潮。对所借场外渠道要主动、尽早介入审查,不能待其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再要清理这方面的影响我们已心有余悸。

虽然在市场异常波动,系统性风险苗头出现时,证金公司与汇金公司将会继续以多种形式发挥维稳作用,但投资者却并不能基于此得出政府不会让股指下跌的预期,更不能依据这种不切实际的预期来确定自己的投资决策。否则很可能会在股灾之后,再陷尴尬境地。

(作者系鑫元基金项目)